

海上文家

自选从



z i y u a n c o n g s h u

红情绿意

江曾培

上海文艺出版社

haishang

红情绿意

海上杂文家自选丛书

江曾培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海上杂文家自选丛书

红 情 绿 意

江曾培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83,000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886-X/I·1520 定价：12.50元

自序

杂文的发展与新闻业有很大关系。报纸与刊物,是发表杂文的主要阵地。中国现代杂文,萌发于《新青年》杂志。陈独秀、胡适之、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在这个刊物上开辟“随感录”专栏,以桀骜锋利的杂文,抨击时弊,呼吁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影响甚大。随后,许多报纸与刊物相继都发表杂文,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在杂文史上功勋卓著,有口皆碑。杂文,遂逐步成为进步报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今天,翻阅各地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发表杂文的,区别只在于有的刊载多些,有的少些,有的作品水平高些,有的低些。杂文与报刊难分难解的关系,造成了杂文史上一种现象:许多杂文大家都做过报刊编辑、记者,有的终身是新闻工作者,如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聂绀弩、夏衍、林放、秦牧以及柯灵、严秀等。当前活跃在报刊上的一些杂文作者,也有不少是报刊工作人员。我们这套“海上杂文家自选集”的作者,大多也都出身于新闻界。

杂文家往往出自编辑、记者,反映了杂文需要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我学写杂文,也是在1956年调入《新民晚报》以后。

那时经常在外面采访,接触了各种人和事,不时生发出一些杂感,促使我操起杂文的武器。由于记者的职业,使自己始终处在生活的漩涡中,为杂文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目,当时写得最多的时候,几乎是每日一篇。“文革”时因此遭灾,被打入“羊棚”,手中的笔被“革”掉了。“文革”以后,我调离了报社,与生活的直接联系减弱,写杂文所需要的敏感也随之减弱,我的杂文写作明显减少。但多年形成的关注现实、好发议论的品性,使我不时还拿起杂文的笔,以至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也积聚了大约二百来篇。

应该指出,杂文虽然在敏锐地反映现实上,与新闻有天然的血缘联系;但它毕竟不等于新闻,它是“文艺性政论”,半是时评,半是文学。因此,它就不但要求敏锐、敏捷,而且要求有形象,有感情。我开始写杂感一类文字时,多“言论老生”式的面孔,呆滞、干瘪。新民晚报社长林放系杂文名家,他给了我指点,说要力求“杂”而有“文”。当时他每天写一篇杂文,思想锋利,行文活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总是反复研读,吸取教益。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自己得以稍有长进。不过,入杂文门也许并不太难,写好它却很难很难。漂亮的杂文,既有丰厚的现实内容,又有深邃的思想见解,还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是锐气、智慧、诗情完美结合的产物。对我来说,穷一生的追求,恐也难臻其境界。

这里收选的一百篇文章,遵照这套书的编选要求,都是新时期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鉴于杂文具有时评性质,目录顺序按发表年月先后排列,以求能折射出二十年来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些痕迹。在这二十年中,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字选得少些,九十年代中后期选得多些,这是因为,我少有

越陈越香,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作品,只能多选些新近文字,使这本选集减少点陈旧感。争取写出一些既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又不是短命、速朽,而能较长时期活下去的杂文,是我永久追求的目标。

书名取自宋人文同的诗句:“红情绿意知多少,尽入泾川万树花”。这一方面,表示我的这些与人为善、与国为善但却含刺的杂文,只有在改革开放这样“红情绿意”的春日里,才能自由地放心大胆地萌芽生发;另一方面,也表示我愿以这些小小的“杂花”,融入“万春花”的神州大地,共同为“红情绿意”的绚丽春日增色添彩。

1998年国庆节

目 次

自序.....	1
---------	---

1980 年——1989 年

时间与文明.....	1
作品鉴赏的“正”“反”观.....	4
论读书要带脑袋	10
甘于寂寞与不甘寂寞	15
“文人无行”析	17
请“老娘舅”少出场	19
唯有实绩高	21
由“小×××”到新“×××”	23
学而优则优	26
说浮躁	29
想起华威先生	32
性爱≠性本能	34
由《故事会》说雅、俗.....	37
花篮与花圈	40

1990 年——1993 年

挂狗头,卖羊肉	42
礼让	44
想起“彼得处方”	46
苦恼的笑	48
得理让人	50
药以对症为贵	53
书迷	56
关于“可读性”的对话	58
草簇的遥看	61
不打印象分	63
“人死观”	65
让“喇叭交响乐”轻些	68
恶趣	71
不要空“等”	73
“食文化”与“文化食”	75
欲望的舞蹈	77
看电视不宜成“迷”	80
憧憬“淘书乐”	83
“存同求异”	86
“天下图书一大抄”	88

1994 年

“羊上树”	91
-------------	----

书店应有书卷气	94
出版是一种选择	96
狐狸的名片	98
不为“老”累	100
功夫在台下	103
幸福递减律	106
想起大众化	109
归来乎,羞耻之心	112
站不住的“垃圾箱理论”	115
话说新行当	118
富裕不可变为“富愚”	121
“哗众”未必能“取宠”	123

1995 年

“认价不认货”	126
需要困难	128
“书中自有颜如玉”另解	131
学会遗忘	134
同名同姓与盗名欺世	137
论只“看”不“读”	140
文坛的“清高”	142
最甜蜜的语言	145

1996 年

文化产品也要创名牌	148
-----------------	-----

注重“名”声	151
满足与不满足	154
“撞车”与“车马稀”	157
休闲更是一种心境	160
苦难造就伟大	163
下士窃名	165
人际交往中的“假”	168
盗版的风景	170
为什么不脸红	172
写作不宜“卡拉 OK”	175
全球成“一村”	178
话说“从众心理”	182
重诺	185
会议费是个筐	187
从曼谷“包公热”说起	190
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有感	193

1997 年

“走宴”	195
“广场”“花园”的冒名顶用	197
散步难	199
需要“心理扶贫”	202
“乐凯”说“不”	204
谣言止于智者	206
拒绝“发烧”	209

再说华威先生	211
模特的洋态及其他	214
抬轿人语	217

1998 年

“不送礼，无以立”	219
话说“特权面子”	222
功夫在书内	225
人格的力量	227
书比人长寿	230
有生有死，“人间正道”	232
商以信为本	235
“以假为真”的文化泡沫	238
儒与商，水与火？	241
也谈“定时炸弹”	244
仕而优则学	247
多点从容	249
快哉十记	252
誉不可巧而立	254
“造大船”与驾“小舟”	257
艺术？垃圾？	259
厚实与空灵	262
让行路者自己掌握命运	265

时 间 与 文 明

看越剧《西厢》和京剧《红娘》，在美妙的艺术享受之余，思想忽然跑起野马来了。我想，张生与莺莺的恋爱，也真浪费时间。这，倒不是指他们的卿卿我我，而是指他们为爱情奔波的许多时间，从现代眼光来看，压根儿是不必去花的。如果没有封建礼教的羁绊，这一对恋人本可以简单明了地去互诉衷情，根本不要去传柬，去琴挑，去跳墙，去害相思病……这要节约多少时间呵！

由此我恍然悟到，旧时生产技术水平的落后，固然虚掷了人们无数宝贵的时间，比如寄一封信吧，现在是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在古代，却要大费脑筋，因而，柳毅为龙女传书，才能成为美谈。然而，伦理道德水平的低下，也枉然地空耗着人们的时间，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思想的闸门这样一打开，类似的事例就纷至沓来。比如，拿宗教迷信来说，伏尔泰早就指出，这是“傻子遇到骗子”的勾当。但是，历史上有多少“香客”，暮鼓晨钟，三跪九拜，枉其虔诚地在那里空抛时间。如果把这些时间用于生产和工作，那将能做多少事呵！思之犹为这些古人惋惜。

这是今之视昔。

后之视今呢？想想这一问题也依然存在。别的不说，后人只要看看王蒙同志那篇《说客盈门》的短篇小说（见今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就会惋惜现在“说客”们虚掷时间也过于慷慨了。一个浆糊厂的厂长，按照规定，处分了一位职工，由于这位职工是县委书记的表侄，在十二天内，竟有一百九十九点五人次（其中一人没有点名，以零点五计算）前来向厂长说情，一位“理论家”由于是厂长的大舅子，整整为此磨蹭了二十一小时。此外，还有来电话说项的三十三人次，来信说项的二十七人次。算算看，这有多少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白白流失了。从后人来看，这比张生跳墙更不必要。因为，张生跳墙，虽然在现在看来，是可以不去做的，但在当时，却是客观情势所逼，他那一跳，是向封建藩篱的一击，是有积极意义的；而现在的“说客”们热衷“烧香”，实际上只是愚昧的“香客”行为，不过，他们迷信的不是偶像，而是权势，崇奉的不是佛经道义，而是“关系学”，为了一己的私利，把大好时光消磨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之中。虽然，造成这一情况，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但无论怎样，它都是伦理道德水平不高的一种反映。其结果，时间与生命，就在这种低级趣味中消蚀了。

而时间，对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的我们来说，是极其珍贵的。郭沫若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热情澎湃地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因此，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时间。为此，个人和社会两方面都要努力。但不论哪一方面，都既依赖于生产技术的提高，比如现在能在家务劳动上来一个机械化，就能发掘出很多时间的潜力；又依赖于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摆脱低级趣味的束缚，集中精力于学习与工作。历史的发展表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愈发展，

时间的生命力就表现得愈充分。浪费时间,往往是不文明的表现。因此,我忽发遐想,觉得即使从珍惜时间、延长生命来说,也应该努力提高社会的道德文明、精神文明。

(1980年1月)

作品鉴赏的“正”“反”观

一、反反不全得正

有一条公式：反反得正。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但在对社会现象的评述中，却不能拿它来到处乱套。

比如说，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是属于“反”的。然而，是否凡反对资本主义的，都姓“无”呢？那可不一定。《共产党宣言》中就专设一章，对形形色色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作了刻画。这当中，封建社会主义“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他们虽然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起劲挥舞，但他们的臀部却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巧妙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它的目的是想恢复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制度，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至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以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罢了。

由此可见，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反反不一定全都得正。

康德是个著名的不可知论者。马克思主义从左边批判

他,指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是可以感觉到的,这当然是反反得正。而马赫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他,从根本上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主张“更纯粹的不可知论”,这就不但没有得“正”,而是“反”得更远了。

这一现象也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来。

金圣叹在他批点的“第六才子书”中,就以“反”的手法,反对“王西厢”中老夫人形象。老夫人这个形象,在“董西厢”里,面目还不是很清晰的,到了“王西厢”,才将她塑造成一个封建家长的典型。这是王实甫的一大贡献。有了这一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就有力地提高了张生、莺莺作为封建礼教叛逆者的意义,从而深化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对这个封建老夫人,当然是应该持“反”的态度的。可是,金圣叹是怎样反的呢?他不是责怪老夫人有封建性,而是责怪她封建性不够。他说老夫人不该住在寺院,而应另有别府,不该让莺莺去前庭、佛殿散心,而应深锁闺阁;如此,就不致“因以失事”了。显然,金圣叹是站在封建立场上“反”老夫人的,这与我们反对老夫人是南辕而北辙。

这就说明,对反面事物的反对者,不能以观其“反”的态度为足,而要进一步察其“反”的立场和观点,这样才会有正确的评价。我以为,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鉴赏和评价文艺作品是有益的。

举例来说,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是实现四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我们理应对它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品揭露和批判了这一社会机体上的脓疮,塑造了一批反官僚主义和抵制不正之风的先进人物,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作品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是“顺乎天理,合乎

人情”的，这类题材今后不仅应当继续写，而且要求写得更深刻。然而，是不是只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就一定“得正”，应予首肯呢？那也不一样。中篇小说《调动》，写一个青年人，在十年浩劫期间受到诬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迫害他的那位县委书记，在当地仍然独掌权柄，炙手可热。这位青年千方百计想调离这个地方。为了能找到一块调动的“跳板”，他断然遗弃了当地的一个恋人，到外地重新物色了一个姑娘作为未婚妻，借此制造了一个“照顾夫妻关系”的理由。为了能打通各个关节，他用两只土手榴弹（本地瓶酒）、一条二十响（香烟）炸翻了张秘书，又用四只洋手榴弹（外地名酒）、一只保温杯打倒了钱副局长，随后又作了“一头配种站的公牛”，为人事局长夫人留了一个娃儿。当调动的最后一关被那位县委书记卡住时，他冒充自己是一位高干的外甥，以“假诸葛吓退真司马”的办法，迫使对方同意了他的调动。无疑的，这篇作品是接触到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问题的，有些细节是真实的，讽刺也是辛辣的，但整个说来，它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思想、态度去反。它所精心塑造的主人公，是以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情绪看待社会，是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玩弄人生。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因为他有某种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行径而给予歌颂。因为，从本质上说，他不仅不是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异己力量，相反，他的作为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之风。正如封建社会主义等等，在本质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而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一样。

由此说明，阅读和评价作品，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思索分析。不能简单地以“反反得正”的